

乐把他乡变故乡 ——“艺术童萌”与虔贞女校艺展馆的未来深圳人^①

张凯琴 [美] 马立安^②

摘要：对任何迁徙到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移民来说，建立对新居住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都是一个困难且折磨人的过程，对于打工者阶层尤甚。深圳市握手 302 艺术中心在龙华区大浪虔贞女校艺展馆开展了为期 3 年的“艺术童萌”项目，其目标是为落户在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的外来工子女提供优质的艺术创意教育。这些居住在周边的移民群体基本没有深圳户口，但通过城市相对先进的定居和教育政策，他们的子女可以在本地接受小学到初中的教育。但这个项目存在着以社交为先的艺术教育理念、实践效果，以及不考虑儿童友好的城市规划空间对于社区和儿童发展带来的局限等问题，由此提出一个有启发的问题，即社区艺术教育应如何为外来工人的孩子在深圳培养归属感。

关键词：虔贞女校 社区艺术教育 不留不动 儿童地理

① 本文为握手 302 “艺术童萌”项目阶段性成果。握手 302 是一间民非机构，成立的契机握手 302 公共艺术项目——从 2013 年在深圳城中村白石洲启动，至今仍在继续的一系列公共艺术创作。机构成员有马立安、张凯琴、吴丹、刘赫和雷胜。握手 302 致力于用艺术发掘城市空间的潜力，试图将艺术还给每一个对它感兴趣的普通人，为城市中难以获得公共文化资源的区域引入文化活力，发现社区的生活智慧并将它们分享给更多人。我们认为艺术应该属于每一个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通过不对参与者的知识背景设限，鼓励人们参与艺术活动，发挥每个参与者的创造力，用艺术作为手段，激发人们思考、表达和交流。

② 作者简介：张凯琴，公共艺术项目“握手 302”合作发起人，中国雕塑学会会员，韩国国际自然艺术组织 Yatoo-i 会员；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公共艺术项目“握手 302”合作发起人，人类学博士。

深圳最著名的口号之一是“来了就是深圳人。”^①实际上，几乎没有单人单凭因为在深圳找到了工作，或租到了住处，就能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在城市中培养归属感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过程，仅仅在最近，新一代在深圳出生的人，才理所当然地认为深圳是他们的家乡。在这个城市近 2000 万的居民中，^②大多数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甚至有些有深圳户籍的人也经常承认，虽然他们在法律意义上是深圳市的居民，但他们心里还是认为“某某地方是我的故乡”。这种感受很正常，归属感既需要法律的支撑，但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状态。一方面，行政归属决定了社会福利的分配，包括教育、医疗保险、养老等权利。虽然深圳拥有一些先进的教育和社保法律，但是，大多数不具有户籍的居民必须将孩子送回家乡上高中。这意味着在深圳长大，但没有本地户口的孩子也很难认为自己是深圳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城市的福利体系内。另一方面，情感归属是指一种毫无疑问地认为“深圳是我的家乡”的认同。在深圳，大多数成年移民继续认同他们童年长大的地方是家乡，即使他们可能已经回不去老家了。也就是说，住在深圳的近 2000 万人口中，只有那些在深圳长大、同时具有深圳户籍的人才能毫无疑问地认可深圳是家乡。

“艺术童萌”项目旨在通过使用大浪虔贞女校艺展馆的空间给外来工的孩子提供艺术教育。“虔贞女校艺展馆”得名于其所在的巴色差会学校的历史建筑物，该学校始建于 1891 年，并一直作为学校的功能被使用到 1985 年。修缮加固后，当地政府计划将该建筑用作社区中心。“艺术童萌”是这个大型项目的一部分，其目标是为落户在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的外来工人子女提供优质的艺术创意教育。居住在周边的移民群体基本没有深圳户口，但通过城市相对先进的定居和教育政策，他们的子女可以在本地接受小学到初中的教育。

① 王京生：《深圳十大观念》，深圳报业出版社，2011 年。

② 深圳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 (<https://opendata.sz.gov.cn>)。以下的人口数据也来自这个网站，以 2018 年的数据为准。

通过握手 302 “艺术童萌” 的系列项目，我们在不断地反思这样一个问题：社区艺术教育如何为外来工人的孩子在深圳培养归属感？

一、关内外社区：移民城市的不同定居状态

深圳以移民城市而著称，但它并不总是欢迎移民定居在这里。在成立特区后的 25 年（1980 ~ 2005 年）中，深圳试图以传统的户籍管理办法应对非常住人口，就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老城一贯的做法。临时工被剥夺了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无法就地上学。然而，在 2006 年后，深圳提出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理念，试图整合其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的管理，之后很少在深圳听到诸如“流动人口”之类的说法。深圳还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调整户籍制度，不仅要容纳大量的移民，还要将移民子女纳入市政教育体系，包括接受义务教育，这种教育条件在初中三年级后有所变化。目前，所有参加中考的学生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在深圳升入高中就读。因此，面对中考压力时，很多浪口的家庭需要面对这样的难题：如何保证孩子就读高中呢（以便未来考上大学）？是让他们留在自己身边好（留深圳），还是回老家读书好？当然，这意味着很多孩子在小学毕业后会与父母分开，因为户口在老家，为能够保证有高中读，所以升入初中时他们就会离开继续在深圳工作的父母回乡。

此外，改革开放头 25 年时划定的“二线关”依然对本地的文化地理和日常生活产生着影响。所谓的“二线关”曾经将深圳市划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如今，深圳人将这两个区域称为“关内”和“关外”。^①在这 25 年中，外来者需要通行证才能进特区，但是不需要任何证件就可以在关外就业。因此从一开始，“关内”的城市化被看作“正式的”，而关

^① 此处的“二线关”是指深圳建市初期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所谓的“二线”曾将深圳市分为“关内”及“关外”两个片区，“关内”包括今天的南山区、福田区、罗湖区和盐田区，“关外”包括今天的宝安区、光明区、龙岗区、坪山区和大鹏新区。当年部分俗语将“关内”叫作“特区”，将“关外”叫作“宝安”和“龙岗”。

外的城市化被看作“非正式的”。为此，特区总体规划的重点是关内，也为关内的常住居民提供基础设施、福利房和住宅区等城市环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罗湖代表特区最先进的城区。而自2004年深圳市民中心建成以来，福田中心商务区的玻璃摩天楼和高端房地产成为深圳新的城市形象。

关外的城市化过程与关内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2005年以前，关外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它在深圳市范围内但是不在“特区”里，然而这种情况依然在影响今天深圳的文化地理。首先，改革开放早期，千百万的农民工移民到深圳找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特区，而是在关外的乡镇工业区定居就业。因此，关外人口不只比特区人口增长更快，而且比关内人口更不稳定。更重要的是，虽然关外本地的乡镇企业率先发展起来，但是关外的基础设施、住宅、交易市场等空间更多是自发形成的。这样一来，关外的发展没有按照一个整体的规划在进行，而是每一个镇里的城市化模式反映着当地的经济资源、地理位置、行政能力等条件。例如，位于关外西部的松岗、沙井、福永、固戍、西乡等乡镇所在的位置可以通过107国道连接深南大道，可以在文锦渡口岸把货接收到香港港口。在这些乡镇，大型工业园区和新村很快取代原来的瓦房、稻田、鱼塘等景观，繁华的商业和娱乐区则在传统的墟市出现。同样，位于关外中央区沿着九广铁路的布吉、龙华、横岗等乡镇也发展得很快。^①2001年，布吉镇被认为是“广东第一镇”，其经济生产总量和其蓬勃增长的人口已经达到与其他地方中等城市相当的水平，当然同时也出现了自发城市化的潜力和问题：一方面，布吉的治安很差，也没有提供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其经济环境比较灵活，很快能适应新的挑战。如今，关外的西、中部的大环境在2005年前已经定型了，而深圳市还在尝试着融合关内外的差异。

^① 读者能够从1982年深圳市城市规划局印制的《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简图》中看到当年深圳市的基本发展情况，从中能够发现，虽然沙井、布吉、大浪的地理位置都位于特区的“关外”，但是沙井和布吉都靠近交通干道，反而大浪却没有连上当年的交通网，处于特区的边缘位置。

2005年前，位于关外东部的乡镇都没有实现所谓“深圳速度”的发展。在深圳的边缘乡镇，制造业往往是低技术和小规模，新村的规模也较小。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乡镇没有迅速地发展，许多历史建筑和老旧的住房没有被拆除，而是被用来作为廉价住房的选项。如今，在这些片区，一间瓦房的租金还是在100~200元。因此，深圳许多的历史建筑物都得以在关外的东部地区保留下来。

2016年，握手302在虔贞女校启动“艺术童萌”项目时，浪口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关外西部（或中西部）的自发城市化定居点，而其建筑环境体现了历史的定居模式如何继续塑造今天的日常城市生活。浪口社区占地5平方公里，有13万人口，其中不到800人有本地户口。由于浪口社区是早期开发的边缘地区，其老村建筑和历史建筑还没有被拆除。当地既有客家瓦房、两座炮楼、小洋房、鱼塘、巷子等村落特色，也有3~9层高的握手楼。这种混合的邻里空间让当地有浓郁的历史氛围。此外，由于这里的工业区只有2层楼的厂房，这些工厂一直提供组装廉价产品的服务，而大量制造业外包给留在家中照顾孙子、孙女的老年妇女。这意味着许多居民都参与了非正式经济，所以即使龙华区早已开始重组经济，这里的经济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当年，因为其交通道路仍在建设中，这里的居民也很难从浪口到龙华甚至关内找工作。因此，可以说浪口社区居民的定义很矛盾，一方面他们没有主动选择留在浪口，另一面他们的生活却几乎都在浪口进行。

浪口居民“不留不动”的状态让人们很难有“归属感”。关于“不留”，在浪口，大多数的人是“做客”的心态，虽然在此租住多年，但也没有计划留在浪口，根源在于他们的住房选择仅限于租赁或“小产权房”，虽然浪口的房租属龙华区最便宜的地区之一，但是几乎所有居民都希望最终能离开该社区。因此，在浪口，居民要么在存钱回老家建房子，要么在等着在市区其他地方找房子。事实上，在“艺术童萌”进行期间，有几名学生陆续搬走了，也有其他学生搬进来的。也就是说，在浪口定居很难。

对居民来讲，浪口是一个“过渡的家”而不是一个“永恒的家”。关于“不动”，由于交通不方便，大部分居民的工作场所离住的地方很近，有些居民也在社区内经营非正式的商业。因此，许多浪口居民有条件与家人在一起，经常能碰上三代家庭居住在一起，父母在工作，祖父母照顾孩子。出自这种家庭的小朋友常常健康又快乐。在进行“艺术童萌”时，我们发现能经常性来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大多来自这样稳定的家庭。

关外社区形成的状态与关内社区非常不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不仅关内社区的管理范围比关外社区面积要小得多，有的甚至仅有十分之一，而且关外社区的人口要多过关内社区，有的社区甚至有15倍之多。比如，东门街道的立新社区占地面积仅为0.45平方公里（是浪口社区的1/10），人口为17500（是浪口社区的1/17）。也就是说，虽然关内社区的人口密度比关外社区要高很多，但是一个社区的居民都生活在一个“步行”范围之内；而在关外，同一个社区的居民需要坐车才能见面。

第二，关内外的人口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关内社区能有一半的居民有深圳户口，其社会资源相对比较健全。因此，关内社区的居民有“留下不动”的条件，除了年轻人以外，还有很多需要照顾的老人，在这些社区里对于老年人的服务已经成为社区工作的重点之一。相比之下，浪口的人口结构不只偏年轻，其社会资源也相对少，让居民拥有教育资源和入门级工作培训成为当务之急。

此外，这十年来深圳在进行去工业化政策调整。在面对这种经济结构调整时，由于历史发展经验不同，关外中、西、东部等社区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例如，沙井、福永、布吉等社区一直在努力提升制造业基础和重组经济。然而，由于物流、教育、金融、设计等非制造业产业主要位于关内，让曾经经济独立的社区越来越依赖社区之间合作的经济资源。于是，地铁沿线和靠近主要交通干线的关外社区早已经转型为商业住宅区了，其目标是吸纳更多“留下不动”的常住人口，其结果是更多“不留不动”的人口和家庭被迫搬迁，搬到类似浪口那样的社区去。与此同时，浪口社区

的低端制造业逐渐向北部被挤出社区边界。但房地产开发并没有快速发展起来，加强了该社区作为廉价家庭住房的一个资源条件，也强化了其“不留不动”的人口特征。

这样的简单对比，突出了移民在深圳范围内什么样的社区定居会直接影响到其归属感的问题。例如，在社区层面，如果邻居也是“过客”，值不值花费时间和感情同他建立关系？又比如，周围如果见不到退休的老人，能否想象自己在本地也能顺利退休安享晚年？从市一级的层面来看，这些过渡社区的经济基础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弱，关外的乡镇企业曾经是独立的经济单位。事实上，关外乡镇企业对改革开放早期的贡献很大，布吉也因此被评为“广东第一镇”。那么，去工业化后，市区如何帮助不同社区居民解决就业难题？邻里关系和就业机会是每一个社区都面临的挑战，而正是它们才能培养居民的归属感。因为人口结构和具体环境的原因，这些问题在关外更加明显。



图3 浪口村街景照片（马立安 摄）

如今，深圳面临着管理的新挑战，类似浪口社区这样面对挑战的关外社区不在少数。而我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将“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样美丽的目标真正实现？以及无论成年人如何折腾，儿童地理依然酝酿着城市的未来。

二、深圳的移民史：教育与认同

深圳的移民历史早在明朝已经有了记载。改革开放前，这里的移民也早已有了国际交流。虔贞女校于1891年建成完工，是瑞士巴差会在广东

省客家乡村建立的 170 多所学校、医院、教会等文化基地的其中一个。传教站的建筑有牧师宿舍、小教堂、校舍、学生宿舍、水井和菜园等。小学为女孩提供科学、数学、语文和外语等文理学科教育，此外还有女红和音乐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校开始接收男生，优秀毕业生可以在香港和梅州的相关学校接受中学教育。传教士于 1948 年离开浪口，学院管理层转移交到新中国政府。建筑作为学校一直使用到 1985 年，直到附近的龙华村建造了一所新的小学。虔贞学校关闭后，该建筑曾被用作临时工厂和仓库。2007 年，当地考古学家张一兵和当地文化干部王艳霞发现了校舍和宿舍。他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项目，了解建筑的历史，并将其恢复为博物馆和文化中心。经过翻新的大浪虔贞女校艺展馆于 2016 年 6 月向公众开放。^①

当握手 302 首次开始在虔贞女校开展每周一次的艺术课程时，我们才开始亲身体会到浪口社区距离深圳中心区有多遥远。虔贞女校位于浪口社区下属的浪口居委会，从深圳市中心到达女校，先需要乘地铁往



图 4 虔贞学校师生教学历史照片
档案来源：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

龙华线的终点清湖站。从清湖站出发，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以到达虔贞女校：一种最方便但也是较昂贵的是通过华明路乘坐 20 分钟的出租车，这条主干道大浪到龙华区政府所在地。在刘屋围路，出租车驶出高速公路，进入浪口社区。学校位于刘屋围路南侧，与浪口基督堂共用一条车道；另

^① 唐冬梅、王艳霞：《虔贞女校》，花城出版社，2015 年。

一种是较为实惠的路径，即从清湖地铁站乘坐 40 分钟的巴士到浪口万盛百货。浪口一路位于万盛百货的后门，横穿一个小工业区和一排握手楼之后就能到虔贞女校的广场。

当我们每周一次从市中心区到这样偏僻郊区时，^①慢慢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学生们并没有体验到浪口的地理位置是“偏远的”，对他们来说浪口是一个“亲密”的地理。年长的学生只能在长假期间来到学校，所以“艺术童萌”日常的学生主要是小学生和他们的弟弟妹妹。与握手 302 成员远距离通勤不同，当地学生在不到 10 分钟内就能走到虔贞女校。浪口的孩子知道哪个小巷直接通往学校，并借道绕过鱼塘旁边的阴凉处；他们还知道哪些小巷被二手电器堵塞，哪些小屋是野生小猫的家园；他们熟悉许多店主。他们还知道哪些中学生和高中生欺负年小学生，以及如何在可能的情况下回避他们，在必要时如何对抗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将我们带到学校的道路反而是学生们的活动边界。也就是说，大路的范围决定了“艺术童萌”能吸引的学生范围。例如，我们没有什么穿过刘屋围路或浪口一路来上课的学生。唯一从这些“边界”外来上课的孩子需要依靠父母接送，但父母繁忙时孩子就不能过来上课。相比之下，住在学校安全步行距离内的学生可以按时独立来此上课。

吸引学生的关键原因还是当地的地理。虔贞女校正门前的广场是附近的公共空间。每天有小朋友在那里玩，每天都有看孩子的老人在那里闲聊。作为一般规则：当我们到达虔贞女校时，学生们在广场玩；当我们下课后，他们回广场去继续。换句话说，对于来到我们班级的孩子来说，学校只是这个广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额外的目的地。“艺术童萌”的学生不仅在学校门前的广场上一一起玩，还进学校一起上课。在这个核心小组的学生中，有十多名经常来上课的学生，还有两名在两年半的课程和夏令营中没有错过一次课的学生！这让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在虔贞女

^① 从位于深圳中心的福田区深圳市民中心到达大浪村村口有近 20 公里的路程，乘坐公共交通需要约 1 个小时的时间，且中途需要换乘不同交通工具。

校提供课程的前提是与广场上的邻居们先交朋友。

通过对比“艺术童萌”师生对空间的不同经历，突出了成人地理和儿童地理之间的重要差异。与成人不同，儿童不开车，不经常使用公共交通，



图7 “艺术童萌”上课、活动的情景（马立安 摄）

并且没有权利决定居住地方。因此，小朋友依靠邻里资源进行生活、教育和游戏。他们的地理完全属于当地。而且，只要孩子们能用步行路径连接他们的家、学校和游乐场，他们就很开心，也很容易产生归属感。相比之下，成年人的地理不属于当地，而是通过交通将住宅、工作场所、娱乐场所等地点串联在一起，这样的地理经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整体”，只有一个“整体的想象”。因此，当成年人离开童年的地理时，他们很难产生归属感。由此可见，为什么第一代移民很难实现“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愿望，除了身为社区的“过客”之外，作为文明程度标准之一的交通系统，让我们很难体验到“当地”本身。可想而知，儿童地理的自然规模直接影响到“艺术童萌”项目的进行和管理。首先，该计划利用了儿童的步行范围，学生在广场玩得开心时，课就上得很顺利^①。

关注成人地理和儿童地理之间的差异，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如果我们的重点不是“如何提高交通效率”，而是“如何培养下一代”，那么无论社会阶层如何，儿童（及其看护人）都需要亲密的邻里地理，才能充分发挥其扎根的潜力。这里要强调的是由于儿童的流动性较低，所以如

^① Grannis, Rick, *From the Ground Up: Translating Geography into Community through Neighbor Network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何抚养孩子是社区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光在几个点分配教育资源是不足以培养城市下一代的，而是要培育好一大批小规模公共空间，才能给小朋友们提供机会。特别是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邻近的孩子最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玩伴。虽然学龄儿童可能有机会在学校或社区以外的其他场所结交朋友，但这些机会取决于父母是否有条件陪他们一起前往。而学龄前儿童在其邻近社区之外获得社会关系的机会更为有限，他们的生活受到地理的严格约束。

三、从“艺术童萌”到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艺术教育如何发挥儿童地理的优势？

（一）“艺术童萌”项目

就内容来讲，握手 302 “艺术童萌”项目的目标同时抱有教育理想和具有实用性。“艺术童萌”旨在培养小朋友的创造性思维，而不是培养他们成为专业艺术家。为此，课程的重点是解决问题，完成项目、学会协作以及培养自信心，而不是教授艺术技法。同时，我们需要认清当地的儿童地理。因此，课程的内容也得要适应和发挥虔贞女校所在的社区条件。

“艺术童萌”的袜子木偶戏、摄影、绘画等课程，都会有一个与社区相关的主题作为引导。比如，袜子木偶戏课让孩子们自编自演关于浪口的故事，而摄影课的焦点是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我们提供设计太阳能风扇和学习设计思维等“创客”课程时，同样强调分析问题和自我表达能力的交叉。例如，在初级的电子电路课程中，我们要求学生为父母或朋友设计礼物盒；为了制作基本电路，我们在给每个孩子一个纸盒、一节电池、电线、三个 LED 灯、一个小风扇等配件之前，先要问孩子们：这个礼物盒的对象是谁？你想通过高科技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引导学生将电子元件集成到盒子的设计中。“艺术童萌”的课程设计需要充分地考虑到浪口社区家庭

的经济条件，旨在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可以立即从教室转移到在家庭里的课后实践，而无须不必要的开销。因此，课程也尽可能使用相对便宜且易于获得的日常媒介和材料。比如，摄影课中，学生们使用手机拍照来学习与视觉观察、表达相关的素养，而课程使用的材料可以在附近的垃圾中捡到。换句话说，“艺术童萌”的功能更像是一个种子，目标是在儿童地理的土壤中培养属于城市的未来公民。

到了项目的第二年，这种教学法培养了几名“小助手”，她们有能力带领新的同学。因此，课程的内容就可以更加深化和复杂，也开始要求学生思考“传统与社区”“城市规划与社区”等命题。2017年的夏令营主题是《古灵感 新传统》，我们带学生们了解麒麟在客家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引导他们每组设计制作一个巨大麒麟木偶，每个小组给他们的麒麟写了一个故事，最后给亲戚和朋友表演。同样，在《连连看》的城市规划课程中，除了让学生设计一个家人能住的房子，还教会学生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如何整合在社区中。最后的呈现要求学生把住宅、学校、购物中心、医院、公园、游泳池都摆在合适的位置，并且要铺设道路、水管、电线、污水管等基础设施。为了使项目更具挑战性，电灯要通过基本电路连接，并且必须可以点亮。

（二）成年人视而不见儿童地理

直到在“第七届深港建筑/城市双城双年展”（UABB，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浪口才有机会展现出儿童地理的巨大潜力。本届双年展将深圳市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从华侨城和蛇口等关内社区引入南头、清水河、大梅沙、上围和浪口等五个关内外的“城中村”。在虔贞女校举办了龙华区（大浪）分展场，主题是《迁徙——故乡与他乡：客家历史再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除了突出艺展馆的常设展览外，本次展览探讨了深圳移民文化的历史：第一部分是“百年相望：虔贞收藏国际交流展”展示了传教士在1948年离开中国时带回欧洲的物品和文件，还有对传教士后代们的采访，这些“中国之子”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当年的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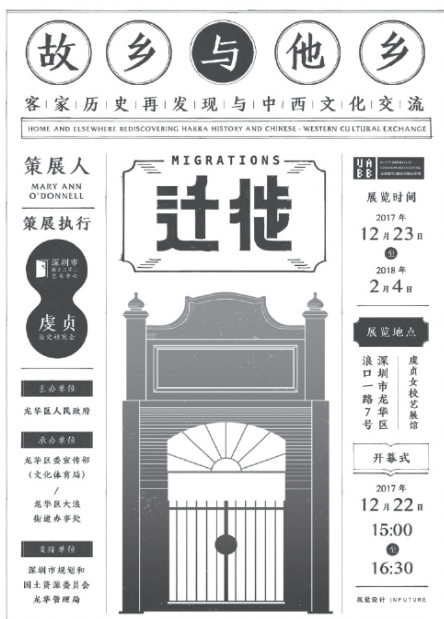


图8 《迁徙》展览海报

在中国出生或成长，对浪口也有着童年的记忆；览第二部分是“遥远的家”，通过艺术家的眼睛看到了客家人如何创造了本地的历史；第三部分包括讲座、展览导览和艺术课程等一系列公共活动。

在形式上，《迁徙》和双年展其他分展场没有区别，都是位于成年人地理中，都是努力把所在地变成目的地。而恰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儿童地理对培养社区的潜力。在其他四个分展场（包括主场在内），观众使用私家车和公共交通

参加。因此，参与的形式很难突破个人活动的范围，而在这样的展览模型中，展览的成功是通过简单的统计数据来评估的，有多少人来过？相比之下，在浪口分展场，当地儿童早已将虔贞女校艺展馆视为邻里地标的延伸，因此《迁徙》的活动顺利成为社区的交流空间。外面的访客来到分展场时，他们除了有个个人体验之外，还与当地的孩子产生交往，也进一步了解深圳社会的未来潜力在哪里。这些孩子们给关内过来的参观者一种归属感：这里是深圳，不只是因为它在行政边界范围内，而是因为有这么些孩子的存在。

《游牧的故乡》这件作品的变化，见证了这种“社区归属”的存在和重要性。四个帐篷组成了作品《游牧的故乡》，陈设在虔贞女校艺展馆门外的广场，为邻里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娱乐场所。然而，在展示的头24小时内，帐篷遭到破坏。更换帐篷不仅昂贵，而且也不切实际。毕竟，一旦新帐篷更换，破坏者也极有可能会继续。作为回应，艺术家张凯琴决定发挥社区作用，收集了旧衣服为帐篷做补丁。这引发了“破坏者”和“修补者”之间持续性的互动游戏：破坏者损坏帐篷和修补好它们循环往复。

重要的是，在修补进行到第二周后，坐在广场的几位阿姨加入了修补活动。她们的参与改善了游戏规则，她们不仅能缝东西，而且天天都在广场看孩子，这样她们也开始帮我们保护帐篷。一旦帐篷被阿姨“收养”，玩耍的孩子们也会更加小心对待帐篷。他们在进去之前脱掉鞋子，保持清洁，并开始指导别人如何使用帐篷。就这样，干净又可爱的帐篷非常受欢迎，青少年和年轻人也开始使用帐篷打电话和打牌。



图9 孩子们修补帐篷，这个作品同时也成了孩子们娱乐和休息的空间（马立安 摄）

（三）“艺术童萌”的经验对其他城市社区有什么启发？

深圳的文化地理，包含了关内外、主流住宅区、CBD办公室、集体工业园区、历史聚落和新的地标等表面上格格不入的不同空间。虽然深圳居民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些空间来实现不同的社会目标，但目前对城市规划和行政地理的理解并没有包含儿童地理。因为大多数公园周围都是宽阔的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所以儿童甚至要等到周末跟父母一起出去才能享受深圳市投入大量资金精心打造的公园。因此，平日在城市路边、停车场等挨着自己住宅区的空间才有可能成为“儿童乐园”。另外，虽然很多住宅区有院子，但是这些花园往往是幼儿无法进入的，因为他们必须乘坐电梯才能到达，可是一旦孩子们到了足够年龄自己去花园时，他们就会发现这些花园对于奔跑、骑自行车、放风筝和打球来说太小了。深圳的孩子们只好自己去发现可以玩耍的空间，这些空间常常离家很近，而且是在不用过马路的地方。



图 10 虔贞女校门前的广场（马立安 摄）

与城市公园和住宅区小区花园相比，虔贞女校及其门前的广场拥有巨大的潜力为当地儿童提供一个方便有趣的公共空间。孩子们平时在广场可以玩耍，与邻居见面，了解世界。有“艺术童萌”这样的艺术

教育项目后，就可以引导他们的身心发展，帮助他们意识到身边社区的可爱，培养归属感。这种课程也是对孩子们和他们的邻里的认可，因此这类项目同时还增加了儿童的自信心，也给他们机会去和爱的人交流。也就是说，发挥儿童地理的重点在于，用成人地理的元素给孩子带去他们应该拥有的教育资源。老师和资源可以移动，但是小朋友是动不了的，所以离他们很近的公共空间才是他们所需要的，城市公园再大再美也不是孩子们能独立享受的城市资源。

用儿童地理的视角来看待深圳的城市空间，也能让我们重新评价社区作为抚养孩子的空间应该如何改善。因为虔贞女校及广场的地理关系合适小朋友，所以“艺术童萌”项目可以顺利进行。有一个现象值得反省：每当握手 302 在浪口举办儿童作品展时，尤其是在双年展期间，我们注意到关内外成年人对孩子们作品的质量感到惊讶和出乎意料。似乎在大多数成年人的观念中，浪口这样相对低收入而封闭的社区，“不留不动”的家长养不出“高素质”的孩子。但是，事实非如此，对孩子们来说，地理最重要的元素恰好是“不动”。他们需要父母就在附近，同时又有可以独自出来玩的空间。有这样的儿童地理时，教育就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就是说，“艺术童萌”的教育项目在虔贞女校及广场这样的儿童地理中所取得的结果，能帮我们重新思考城市应该如何规划用于培养和适应下一代的地方。

Happy Migrations: Cultivating Future Shenzheners through the “Art Sprouts” Program at the Longheu Girls’ School Art Gallery^①

Zhang Kaiqin, Mary Ann O’Donnell^②

Abstract: Anyone who moves to a new city to work and live quickly discovers that building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their new home is a difficult and tortuous proces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migrant workers. From 2016 through 2018, Shenzhen Handshake 302 Art Center ran the three-year “Art Sprouts” project at Longheu Girls’ School Art Gallery in Dalang, Longhua District. The project aimed to provide high-quality art creative education for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ho had settled in Langkou Community, Dalang Subdistrict, Longhua District. Although these immigrants did not have Shenzhen hukou, nevertheless, through the relatively advanced settlement and education policies of the city, their children could attend primary and junior middle school local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s and practical effects of social art education in this project,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child friendly urban planning space on community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① This article is the result of “Art Sprouts” program of Hand shake 302. Handshake 302 is a civi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hich grew out of the “Handshake 302” public art project. In 2013, Mary Ann O’Donnell, Zhang Kaiqin, Wu Dan, Liu He and Lei Sheng launched the project in Baishizhou, Shenzhen’s most iconic urban village. Handshake 302 aims to return art to ordinary people, introduce cultural vitality in areas with limited access to public cultural resources, discover and share community wisdom,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space through art. The organization encourages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artistic activit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creativity, regardless of background because art stimulates thinking,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y believe that art should belong to everyone who contributes to the city.

② Zhang Kaiqin, Cofounder of the public art project “Handshake 302,” member of China Sculpture Society and yatoo-i member of the Korea International Natural Art Organization. Mary Ann O’Donnell, Cofounder of the public art project, “Handshake 302,” holds a Ph.D. in Anthropology and is co-editor of Learning From Shenzhen.

asking, how should community art education cultivate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 the children of Shenzhen's migrant workers?

Keywords: Longheu Girls' School, Community Art Education, Staying in Place, Children's Geography